



未名社科菁华·国际关系学

国际关系理论：反思与重构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REFLECTION AND RECONSTRUCTION

秦亚青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未名社科菁华·国际关系学

国际关系理论：反思与重构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REFLECTION AND RECONSTRUCTION*

秦亚青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国际关系理论:反思与重构/秦亚青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4
(未名社科菁华·国际关系学)

ISBN 978-7-301-20401-6

I. ①国… II. ①秦… III. ①国际关系理论-研究 IV. ①D8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46061 号

书 名: 国际关系理论:反思与重构

著作责任者: 秦亚青 著

责任编辑: 徐少燕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0401-6/D·3075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信箱: ss@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62754962

编辑部 62765016/62753121

印 刷 者: 三河市博文印刷厂

965 毫米×1300 毫米 16 开本 18.75 印张 316 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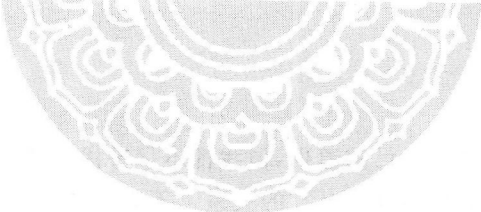
2012 年 4 月第 1 版 201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8.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前 言

这本集子是《权力·制度·文化：国际关系理论与方法研究文集》的续集，也是在其基础上进一步的研究和思考。近年来，我在学术研究方面主要做两件事情：一是继续关注世界上国际关系理论的前沿发展，这更多地是接续《权力·制度·文化》；二是思考如何构建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这是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反思和对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感想。正因为如此，这本集子也分成上下两编，上编是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解读，下编是对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思考。我在这里想谈三点想法，是与选择这本文集的文章相关的：一是学习与创新的关系，二是对中西学问的反思，三是做学问的体悟。这些想法，以前在不同的场合也说过，现在汇总起来，作为这本集子开头的话。

一

先谈学习与创新的关系。

这样一个话题，近似“六经注我”和“我注六经”的关系。这本文集在结构上试图表现一种学习与创新的相辅相成的关系：既要“六经注我”，也要“我注六经”；既要以经典文本为主理解思考，也要以我为主体悟探索。关于学习与创新的关系，近年来，国内社会科学界对学术研究的争议不少，有两种观点十分突出。一种观点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见证了又一次的西学东渐，西方已经比较成熟的理论和学术研究成果被介绍、被引进，这种情景已经有 30 年的历史了。现在引进应该停止，因为已经到了中国创造的时候了。另外一种观点是，学习还远远没有终结，中国学术的道路还很长，现在仍然是要认真学习的时候，所以应该更加努力地学习，直到学习成熟为止。

这两种观点都有自己的道理,但我都不尽赞成。谈到这对关系,也就想到了“六经注我”和“我注六经”的关系。不少人将它们视为两种治学态度,但我以为“六经注我”和“我注六经”不是相互排斥、相互矛盾的关系,而是一对相辅相成的关系。孔子早就对学与思的关系作出了精辟的解读。从某种意义上也就是说,学习和创新是互补的。首先,学习没有终结。学习的过程是一个漫长艰辛和与时俱进的过程,学习的过程也是一个没有终点的过程。应该认识到,经过 30 年的努力,我们的国际关系教育和研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无论是在学科方面还是在研究成果方面,都经历了迅速发展的时期。尤其是在学术成果的数量方面,我们每年都产出大量的论文和著作。但是,我们的差距依然不小。这尤其表现在质量方面,我们的研究成果在学术上与世界高端相比,仍有明显差距。许多时候,我们似乎距离高端仅有一步之遥,但是这一步之遥是最艰巨的攀登。另外,国外的学术也在不断发展,不断创新,不断生产出新的知识。最近,美国康奈尔大学的彼得·卡赞斯坦主持了世界政治与文明研究,形成了一个大的系列,成为国际关系新的知识增长点。我们必须继续学习,必须认真学习,因为学术来不得半点虚假浮躁和自以为是。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不好是说不成好的。

但是,学习就只意味着接受和吸纳吗?决然不是。即便是精通了六经,还是要说出自己受到的启迪、自己产生的感想、自己得到的体会,这样才能为知识的再生产作出铺垫。学习的过程也是创新的过程,在学习中创新永远都是学者的亲历。没有一个学者不是在天天学习,也没有一个真正的学者不是在天天思考问题、努力创新的。作为一个学者,是活到老、学到老;作为一个学科,它没有终老,因为它是一代一代学者的学习过程和创造过程。正因为如此,我们需要既学习又创新,既引进又生产,既从别人的思想中受到启迪又以自己的思想启迪别人。学习和创新不是不可调和的矛盾对立面,而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它们永远是相辅相成、相互促动的。没有学习,何谈创新?改革开放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连国际关系学科的基本知识结构都是七零八落,即便有闪光的想法,也无法成为学术的成果。通过学习,我们已经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学科体系。没有创新,何为学习?如果学习只是为了怡情、只是为了博采,如果学习只是为了学习,那也就失去了学术的真实目的和学者的崇高情怀。牛顿说他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之上,也是说明了这种既学习借鉴又勤思创新的关系。

我们谈学习,不外乎两种学习,一是批判性学习,二是启迪性学习。在文献梳理的部分,我们历数本学科、本问题的研究成果,不正是向前人、



向他人学习吗？我们仔细地咀嚼他人的研究成果，从这些研究中得到知识。同时，我们不满足得到的知识，我们在得到知识的同时也在思考，思考这些知识成果的缺陷和问题。一旦我们发现了这样的缺陷和问题，我们就为进一步的研究打下了基础，也就是为创新打下了基础。在梳理文献的时候，要深入地理解文献，但更要以“我注六经”的心态，去反思、去批判、去寻找创新的空间。在提出自己的观点的时候，既有批判，也有借鉴，更有独到之处。所以说，学习和创新永远是一对相辅相成的东西，永远是一对互相推动的生命元素。

学术是永无止境的，因为它启动的学习过程、思辨过程、知识创新过程是无止境的。学术的过程就是一个创新的过程，因为它永远是一个开放的过程，以开放的心态汲取各种营养，以开放的心态生产各种知识。

我将这本集子的结构定为上下两编，上编更多地是学习，当然这种学习汇入了自己的解读；下编更多地是试图做出一点新的东西，当然这种创新的尝试也仍然不成熟，但至少从本书的结构上反映了我对学习和创新的认识。

二

再谈西学与中学的关系。

这样一个话题，可能会使人联想到“体用”说。这本文集收入了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解析，也收入了对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思考。这就难免涉及我们自鸦片战争以来一个始终未了的话题，即中学西学的问题。自从张之洞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说法以来，体用之争一直此起彼伏，许多时候都在话语建构过程中掺杂了许多政治和权力的成分，许多时候也混合了大量当下国际政治的因素。随着中国与国际社会关系的发展与变化，论争也此起彼伏，似乎从未有过普遍认可的结论。

我无意加入这样的论争，但是，既然是做国际关系理论，必然要涉及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也要涉及中国人的思想和实践。所以，也无法完全避开这个问题。我在中国国际关系学会举办的一次博士生论坛上致辞的题目明确地反映了我的观点，即“世界为体，全球为用”。这句话的含义是，当今的学问已经难以属于某个典型的纯种，大多数都是融合了不同源泉的营养，在不同文化、不同地域的思想的交流和冲撞中产生灵感，在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交流、交汇和交融中产生启迪。具体来说，哪一点就是固定的体，哪一点仅仅是为了实际的用，是很难讲得清楚的。所以，在做



学问的时候，“跨东西文化，写天下文章”的胸怀和气度是很重要的。试想，我们这 30 年如若不是认真地介绍评析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国的国际关系学科会有今天的进步吗？谦虚认真地学习西方半个世纪以来发展起来的国际关系理论，反映了我们学习一切外来文明优秀成果的胸怀和气度。

那么，为什么要做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呢？回答很简单，是为了丰富国际关系理论的知识宝库。中国的传统、思想、实践中有着许多值得挖掘的东西，有着许多产生启迪的内容。从人类发展的历史来看，思想从来都是多元的、多维的、多样的。只有不同思想的交流和交锋，才能建设起宏伟瑰丽的知识大厦。当思想被单一、被单维、被单极的时候，也往往是最蒙昧、最混沌和最专制的时候。西方自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以来，产生了大量的思想，建立了现代科学体系，为人类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在国际关系领域，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也走在了前头，对世界国际关系学的知识体系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但是，一旦这些思想形成了话语霸权，学术就无法发展了。学术原本倚仗的就是思想的竞争，学术的进步原本倚仗的就是质疑与反诘。西方 20 世纪以来对理性主义的批判、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批判、对文化中心主义的批判，表现了西方内部的反思和进步，促进了西方学术的持续发展，也说明学术应该是最具民主意识、最具开放意识的领域。从 20 世纪后期至今，西方以外的思想也开始对西方的主流学术传统提出了质疑和反诘，这是世界学术界的一件大事，也会进一步推动学术的繁荣与发展。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这里面积淀了精华与智慧，也包含了糟粕与世故。提炼精华，摒弃糟粕，并且能够使得这些精华和智慧在当下乃至以后的国际社会中产生影响、发挥良性的作用，这是建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一个重要的考量。但是，我们建构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不是内向的、怀旧的，而是面向世界、面向时下的，是为了丰富国际关系知识体系，使得这一思想宝库更加绚丽多彩。我主张使用“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这样一个概念，也是要清楚地表示，如果有一天，我们建构起世界国际关系学界真正认可并高度重视的理论，那也是世界国际关系理论大厦的组成部分，是诸多学派中的一支，而不是用我们的思想和理论取代其他思想和理论，用我们的思想和理论建立新的话语霸权，更不是提倡文化民族主义和文明冲突主义的。当今的潮流是世界社会和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在物质性领域，这意味着任何国家或是集团，无论其实力多强，都无法统治世界，都无法横行四海，也都无法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图和自己的利益去



解决问题。在思想领域,这意味着,任何话语,无论其力量多大,都无法一统天下,都无法唯我独尊,也都无法将己之思想强加于人。这样的大势为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不同文化、不同实践社群提供了重要的机遇和广阔的平台。

中国五千年的历史和文明,已经在诸多方面说明了中华民族的实践活动可以产生不同于西方历史的理论思想。西方学者对西方历史的认真研究和考察,发现了许多重要的规律,建构为重要的成体系的思想。在西方的一些非西方裔学者,大概是凭借自己的感性知识和对自己民族文化的认知,提出了一些重要的学术观点。仅就“均势”这一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基本观点而言,两位亚裔学者就提出了根本性的质疑。西方学者根据欧洲的历史和二战后的国际关系史,认定实力均衡是保持和平的重要条件,“制衡”也就成为实力均衡的关键机制。许田波比较了中国先秦时代和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建立之前的欧洲,认为当时这两个体系有着很多的相似之处,但是,中国走向了大一统,而欧洲走向了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的主权国家国际体系。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的诸侯国没有采取欧洲历史上那种制衡的战略,均势理论在这里失去了解释力。韩裔学者康灿雄回顾了朝贡体系内国家的行为,发现在这一体系中很少发生制衡的现象,比较明确的权力格局、身份认定和偏好结构不仅使得制衡没有出现,也维持了体系自身的稳定与体系成员之间的和平。不同的文化共同体、不同的实践互动,导致了不同的体系结果。无论是许田波的比较研究,还是康灿雄对东亚体系的分析,都对均势理论提出了质疑,以反例说明了这一理论的不足与问题。进而,这些研究也表明,不同文化中可以产生不同的理论。他们的研究,以不同于西方的视角,以非西方的历史经验,挑战了国际关系学界的重要理论,并以此受到西方国际关系学界的高度重视。

这确实是一方值得努力探索的天地。所以,近年来国内学者也在作各种探索。我在一篇文章里使用“正向格义”、“反向格义”和“交互格义”对这些努力进行了分类,分别代表以中国传统文化哲学发展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解释国际关系现象,以西方的国际关系思想体系发展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解释国际关系现象,以及以中西交汇的方式发展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和解释国际关系现象。这是一种简单的分类,不一定十分准确,只是大致勾勒了一幅研究类别的图式。这些做法都是对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严肃思考和积极推进。我自己采取的更多的是“交互格义”的方式,即深入研究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尤其是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实践惯习,同



时结合使用西方理论化的建构方式,将中国的智慧和思想加以概念化和理论化,使之跃出单纯经验的层面。

这本文集收入的论文,也试图体现一种治学的态度:思想上的中国审美情致、论述上的西方思辨理路。这就是我称为“交互格义”的方法。

三

三是一点学习的体悟。

这本文集所选的文章,无论水平如何,都是我自己比较用心地写出来的。除了所选论文符合上下两编结构的要求,还是自己比较喜欢的文章。这就涉及一点做学问的体悟。王国维治学的三种境界,是人们耳熟能详的经典。他在《人间词话》中说:“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

王国维用三句词表达了三种治学境界,更确切地说是做学问的过程。第一境界说的是视野。治学必先有视野,望尽天涯路,知别人已做什么,什么仍然未做,这是首先要弄明白的。当然知道什么是重要的,什么问题是不重要的,也是做学问首先要作出的判断。第二种境界是勤奋。勤奋到茶饭不香、坐卧不宁的地步。光是苦读,也未必如此,自然也包含着苦思,实际上,苦思比苦读更会使人衣带渐宽、使人身心憔悴。第三种境界是顿悟,灯火阑珊的辉煌,手擎辉煌的喜悦,大功告成的轻松。阿基米德赤身裸体从浴缸中跑出来的时候,大概就是这种心情。

从谋篇,到著述,到成就,王国维先生大概是要表述这样一种过程。李商隐的无题诗脍炙人口,其中有三句也可以用于治学,大概不能算是境界,只能算是方法,抑或其他。第一句是“嗟余听鼓应官去”,通俗地说,就是用手做。用手做学问的人求应差而已。看到许多学子,每天要应付诸多的论文和作业,大多是用手做出来的。也就是稍稍思考甚至不加思考就开始动手,限定三个小时必须完成。如今又有了网络,如虎添翼,拼贴一番,也就完成了论文或是作业。整个过程不经过大脑,做完之后,仍是不知为不知。即便是多年研究的学者,也会或是难脱穷于应付约稿和项目的尴尬,或是不能承受虚荣之轻和口舌之重,用手做学问的也比皆是。即便是国内外的大学者,代表作也不过一二,人的精力毕竟是有限的,但对人的要求则是无限的。故人们许多时候都是会“走马兰台类转



蓬”的。

第二句是“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暂且称之为用脑做。用脑做就是竭尽全力、绞尽脑汁地去做学问。用尽全身心的气力，不得有半点的懈怠和恍惚，丝尽泪干，无论是从意图还是从行动上讲，都已经是无可挑剔、无法指责了。用脑做学问可以做得不错或者说做得很不错。因为做的人已经是用尽了浑身解数，也是努力想做好的，其结果必然不会太差。除了那些仅仅为得学位而读博士的人以外，当今不少的博士生都是用脑做学问的。他们经过了课堂学习之后，就进入了苦思苦读时期，为构思而精疲力竭，真可谓“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所以，写出来的论文自然不会太差，有的甚至是其终生的学术高峰。这大概就是因为不管他的智商达到什么程度，他都耗尽了每一个大脑细胞。但是，他能否更上一层楼，还不仅仅需要殚精竭虑的苦功。

第三句是“心有灵犀一点通”，或曰用心做。用心做学问是将自己融在了学问里边，学问成了自我的感悟和体认，成了你中有我和我中有你的化境。做出来的学问里面就有你的容韵、风骨、气度、精神。有人称其为风格，我以为风格还不能完全达其意，所以还是想用灵魂。但凡古今有影响的成果，大概都是用心做出来的学问，做出来的学问总是附着学者的魂。其实，这样的学问不是做出来的，而是悟出来的，是灵动出来的，是抖擻出来的。做学问的人和所做的学问相互敞开心扉，如好友神交，灵犀互感，心心相印，一点相触，四下汇通。有人称之为天才。据说爱迪生这位大发明家的名言是，成功靠的是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和百分之一的灵感。我们的老师也都是这样鼓励我们刻苦学习的。但是爱迪生这句名言后面还有半句，却被人们有意无意地省略了，那就是“最重要的是这百分之一的灵感”。刻苦努力是抱定“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的决心就可以做到的，但灵感却不是通过坚定的意志就可以得到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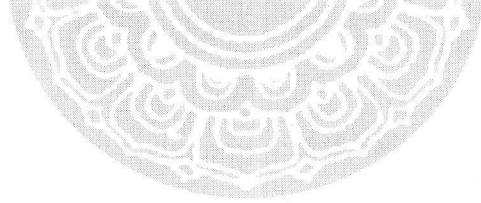
我是个教书的，所以先说的是做学问。其实推而广之，何行何业不是如此？比如艺术。画匠与画家之间的区别大概就是画中有没有附上自己的魂。说到附魂，就想到蒲松龄，他的那些既稀奇怪诞又亲切感人的故事其实都是附着他自己的魂，所以写成了千古绝作，也才能够写鬼写妖高人一等，判贪刺虐入骨三分。有一年我到山东淄川柳泉蒲家村去参观老先生的故居，在小街上看到一间店铺，里面有一个人在写中堂。进去一问，他正是蒲松龄的嫡系重孙。他写的字十分工整，方方正正的中楷，录下《岳阳楼记》、《小石潭记》等名篇。我站在那里半天，他只写了十几个字，一笔一画，极其认真。屋里的墙上挂着几幅，每一幅落款处都写着“蒲松



龄第×代孙×××”。字写得不错，卖得也还可以，我自己就买了两幅，后来还请人又代买了四幅。但这书法似乎总是不像蒲松龄的文章，因为柳泉居士的灵魂游走在字里行间，那些可爱的画皮鬼仙个个是活灵活现的人，因为她们附的都是聊斋主人的魂。连这位蒲松龄的后人自己也说：“我的字没有魂，所以不活，我家祖宗的书有灵，所以鲜活。”

我这本书里收入的论文，应该说是用心做的。不管悟性和造诣如何，毕竟是认认真真做出来的。这些年算起来写了不少文章，但是在为这本集子选论文的时候，我有一个基本标准，即从中选出那些自认为是用心做出来的文章，唯此才能对得起自己的工作，对得起读者的选择。





目 录

上 编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评析

文化与国际社会	
——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述评·····	(3)
国际政治的社会建构	
——温特及其建构主义国际政治理论·····	(31)
理性与国际合作	
——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述评·····	(63)
国际关系理论的争鸣、融合与创新·····	(91)
现实主义理论的发展及其批判·····	(114)
文化、文明与世界政治	
——不断深化的研究议程·····	(142)

下 编 中国国际关系理论探索

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进步与问题·····	(157)
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问题与中国学派的生成	
——英美国际关系理论的比较研究及其启示·····	(196)
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生成的可能和必然·····	(215)
关系本位与过程建构	
——将中国理念植入国际关系理论·····	(230)

中国文化及其对外交决策的影响·····	(258)
研究设计与学术创新	
——以国际规范为例·····	(273)
后记·····	(287)



上 编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评析



文化与国际社会

——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述评

内容摘要

建构主义是 20 世纪 80 年代发展起来的国际关系理论,现已成为与现实主义、自由主义三足鼎立的主流理论。本文追溯了主流建构主义的思想渊源,从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视角对主流建构主义流派做出了分类,讨论了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基本观点,分析了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在中国的发展。本文认为,社会学、语言哲学、国际关系理论构成了建构主义的三个借鉴源泉;关注主体间性,重视观念、身份和规范,强调对社会意义的理解,这构成了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基本思路;建构主义理论对可变性、不确定性和主体间互动意义的认知也与中国思维方式有相同之处。



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是 20 世纪 80 年代兴起的。当时,冷战已近结束,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辩论的强劲势头已经过去,国际关系主流理论之间的论争也达到了难以出新的地步。到 80 年代末,虽然两大学派的竞争和自由主义的复兴推动了国际关系学术发展的进步,产生了许多对这两大流派理论进行经验性验证的学术著述,但新的思想却不多见,研究议程越来越集中,观点交锋越来越缓钝。而在国际关系的真实世界里,东欧剧变和冷战结束,无疑使得人们反思国际关系主流理论的解释能力。所以说,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兴起也就似乎是正逢其时了。

我国从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开始介绍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其后,发展势头强劲。出现了一批译著、专著和论文。但是,我们也发现,研究的重点集中在亚历山大·温特的结构建构主义上面。一方面,这大概是因为温特建构主义在西方也是与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对话和交锋最频繁的理论。以美国为例,建构主义的主要实证著述大多是在以温特为代表的理论框架中展开的,因为温特建构主义比较容易产生具体的研究纲领和理论假设,与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理路是一致的。像卡赞斯坦、芬尼莫尔等学者在研究设计上面,基本都属于这个行列。另一方面,其他建构主义理论,尤其是偏向语言学和后现代的建构主义理论,往往难以产生可以操作的研究议程和难以进行实证性验证。虽然这些理论的分析十分深刻,学术价值也很高,但比较偏向后现代理论,可操作性较低,应用性较弱,所以,人们的关注度就比较低。在西方如此,在中国也是如此。

如果是为国际关系研究人员提供一个比较完整的主流建构主义图谱,就需要包括奥努弗、克拉托赫维尔、温特、鲁杰、卡赞斯坦和江忆恩等其他建构主义的重要学者。所谓主流,是指承认社会理论可以解释社会事实和理解社会意义的理论,是以“立”为主的理论。^① 他们提出和发展了这些理论,目的是使人们能够更加深刻地认识国际关系的世界,理解世界政治的意义。如果使用鲁杰的分类方法,主要包括新古典建构主义和

① 对于什么是“主流”建构主义,可能会有许多不同观点。这里只设定一个标准,就是承认社会理论具有基本的物质基础,具有说明和理解作用,并试图建立这样的理论。这便将批判建构主义和后现代建构主义排除在外。因为前者的目的不是说明和理解社会世界,而是要改造社会世界;后者则不承认一个基本的物质基础,认为一切全是人的建构。当然,这种区分也是为了分析的方便,在一些理论边界区域是难以完全清楚定义的。

